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一百零七期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日

编者的话：“太平间”、“太平门”往往恰恰是不太平之所在，九大期间，毛泽东强调，要把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同样具有反向的寓意。邱副总长却似乎看不懂其中玄机：为什么紧接着又开始闹林彪，闹军队了？

团结固然是美好的愿望，问题却在于为什么不团结？

当时的权力架构叫“老中青”。这一以年龄划线的叫法用意在于掩盖实际的权力架构——在中央是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国务院业务组，在地方是老干部（原“走资派”）、军代表和造反派，而让这些势力实现“三结合”，显然有天然障碍。

这些矛盾正是中共历史的积淀。毛在九大上讲述两条路线斗争，主要分为两段，一是战争时期，一是文革时期。于是，中共的历史主要就成了革命的历史，革命和继续革命，或者按毛所说，革命和“二次革命”。借用鲁迅先生曾经的传神的说法，叫做“革命和革革命”。所谓革革命，就是革革命的命。如果说老干部代表革命，那么造反派就是革革命，军队则是又革命又革革命，不但是革命的功臣，文化革命又立了新功。

毛泽东引为自豪的平生两件大事，就是革命（把蒋介石赶到几个小岛上）和革革命（打倒刘少奇和“走资派”）。代表革命的老干部和代表革革命的造反派都该有赏，遑论双料功臣解放军了。但要把革命和革革命搞到一起是不容易的。更要命的是革命加革革命的解放军和革革命的中央文革之间早就势同水火，而军队已

经坐大，大有权力从刘少奇手里夺回又落到林彪手里的危险。“老中青三结合”局面如此难堪。

那些九大会场内外明争暗斗的小动作，军队明明应该支左却支右、和走资派搅到一起打击造反派的“前科”，以及亲历“武汉事件”的隐痛，使毛开始绵里藏针地警告“军事官僚专政”的危险——同文革前一样，毛又一次感到被架空，接班的问题仍无着落。

对九大人选，除了“三结合”，毛还强调要反映“时代的特点”和“历史的必然”。反映时代的特点就是认文化大革命的账，反映历史的必然就是造反派入选。这就是毛强调的所谓“团结”的主旨所在。但军人们只认前一个账，因为他们是文革的受益者，对后一个账，他们是抵触的，那伙人是他们权力斗争的主要对手。

闭幕时毛说九大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全国人民闻讯欢欣鼓舞，敲锣打鼓连夜游行。九大以后，诚如邱副总长所说，“碰头会没有了，中央文革没有了，政治局在总理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张春桥一个时期回上海工作了，江青没有具体分配重要工作，中央的日常工作是顺利的。”“军事官僚”们以为赢了一局。也许，只有毛和少数当局者心里明白，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斗争不断升级，从针锋相对到你死我活，这种蛇鼠一窝的团结终将破局，“九一三”的引信开始冒烟。

（本期内容节选自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邱会作回忆录》）

邱会作纵观九大

关于起草文件的问题

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文

化革命的大风浪之后召开的，江青、康生把持的中央文革想要独霸对大会的领导。为此以林彪、周恩来为首，以军委办事组为骨干，以及当时在前台工作的同志们和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斗争的中心问题，就转为在九大为保卫党的领导权和江青一伙夺取党的领导权的斗争了。

按照常规，党的代表大会之前必须起草好两个文件：《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谁作政治报告没有什么可争的，毛主席早就指定林彪代表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按照惯例，修改党章也要向大会作正式报告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但关于修改党章的问题是否还需要在大会上作报告没有定下来，谁作报告没有谈过，一切都要主席来定。

关于修改党章的问题，早在六八年三月间中央碰头会议就决定：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为修改党章的起草小组，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是上海帮一手包办的。六八年九月间，我代表军委办事组参加了一次张春桥主持的新党章的座谈会。在会上，张春桥首先说：“今天大家看到的新党章草稿，是上海革命造反派的集体创作。完稿后，又在群众中广泛地征求意见，大家一致赞成这个稿子。大家可以提意见，可以局部推翻，也可以全部推翻。”稍后，张春桥带有得意的神态说：“新起草的党章只有三千多字，恐怕是我们党有史以来最短的党章吧。大家还可以增加与减少。增加容易，减少就有困难了。”他讲完后就起身走了，由一般工作人员收集座谈意见。结果是座谈会变成了“无言会”，一个发言的也没有，“座谈会”也就结束了。

我看到的新党章第一稿就有“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字句。林总看到之后，甚为吃惊！六八年九月间，新党章在提交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之前，林总主持了一次中央会议进行讨论。这次讨论，到会的人比较多，除了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之外，还有各单位的一部分负责人到了会，我也代表军委办事组参加了会议。林总在会上提出：要把“接班人”的字句删去。但是会场上关于“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呼声是一边倒的，对新党章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会议开了不到两小时就结束了。

新党章经过中央文革建议、中央碰头会议讨论之后，将新党章提交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毛主席同意了。这样，毛主席就算正式承认林总是自己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了。但林总自己还没有接受，在九大开幕之前，即新党章将要提交大会审议通过之前，林总再次向毛主席提出把“接班人”的字句从新党章上删去。对此，毛主席没有从正面回答问题，但在会上说：“一个人过分谦虚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比如说，大家要选我当主席，我硬是不干，就不能说服人了。”这很显然，主席就是要林总不要再提出在党章上删去“接班人”的字句了。从此以后，林总就再不提意见了。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张春桥等人在起草新党章的时候，原来的打算是林彪、江青的名字都上党章。例如，提林彪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提江青为“文化革命的旗手。”这个问题刚一提出，连党章初稿都未上，就被康生坚决制止了。康生说：“你们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大家若不谨慎，搞不好就会把得到的东西也丢得一干二净。”因为康生是他们的灵魂，他们也就不得不同意康生的意见了。江青的名字没有上党章，她是很不满意的。

起草政治报告的斗争，同样是复杂又尖锐的，陈伯达向我们靠近后，讲过这方面的事情。八届十二中全会后不久，陈伯达就向毛主席请示了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毛主席的具体指示，起草时间就拖到六九年春节之后了。主席叫陈伯达去谈了一次起草报告的问题。主席说：对这个问题，现在就得做准备了，凡事赶早不赶晚嘛。主席指示，由陈伯达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张春桥、姚文元辅助。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陈伯达同林总去商量。其实主席决定由林总做政治报告后，林总自己就开始拉条子，并告诉办公室的同志们他已有了一个基本构思，陈伯达来了可助一臂之力，这个政治报告的主题思想很快就定下来了，标题定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

主义国家而奋斗》。

提出这样的思想，对经过几年暴风骤雨的文化革命来说无疑是正确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林总“克己复礼”的思想就很重了，毛主席把“刘、邓”和“彭、罗、陆、杨”这些人打倒了，应该满意了，文化革命这几年确实搞得很乱，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全国上上下下搞夺权、搞武斗、搞派性，经济形势不好，应该“复礼”了，全国应走上正常秩序，注重生产，发展经济。陈伯达也注意到不要“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现在看来，他们的想法是对的。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陈伯达初稿的第一部分就出来了。

对初稿的第一部分的讨论是由总理主持的，总理看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样的标题，应该是同意的，但总理深知，这样的主题，在主席那里是通不过的。他明明知道陈伯达是对的，但他还是以陈伯达延误了时间，并且只拿出第一部分为借口，否定了陈伯达。总理的确是智慧超人的。

这样，江青一伙来劲了，他们明明知道是主席指定林彪做政治报告，也知道林、陈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但江青装着不知道，指着陈伯达的鼻子大发脾气，把他大骂了一通。

江青说：“中央文革向来是集体领导，为什么起草报告就连屁都不放一个。我认为你陈伯达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另外，江青还说：“稿子上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你搞的唯生产力论，你是以修正主义的观点起草报告的。”江青讲了之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像放连珠炮一样地指责陈伯达。

主席同意了江青的说法。现在看来，是不是主席本来就对陈伯达失去兴趣，青睐张春桥、姚文元，从而对陈伯达来了个“欲擒故纵”就不得而知了。但从事情的结果来看，是这样的。尔后，主席又叫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重新起草，从此，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权力，上海帮就夺到手了。

其实，张春桥、姚文元早就在上海组织人起草好了政治报告。三两天之后，稿子就拿出来，直接送毛主席了。毛主席对稿子做了很多的修改。江青看到他们起草的九大的政治报告毛主席都看过了，也就是“过关”了，她高兴极了，在一次会上，江青对陈伯达用“商量”的语气挖苦说：“对我们起草的政治报告，请你在毛主席修改的稿子上再修改吧！”

陈伯达还老实巴交地说：“我拥护毛主席的修改！”他的用词也很有意思：不说同意稿子，只说拥护修改！

林总知道江青把他和陈伯达共同起草的报告“枪毙”了之后，对报告的问题，就当“闭口道士”了，此后有关报告的全过程，林总一句话不说，一个字也没有写过，政治报告是上海帮包办的。

开幕式

九大开幕之前，九大代表都来了不短的日子了，可是会议还没有召开，总理解释其原因是汪东兴病了。其实，九大的准备工作，主要是总理、黄永胜、张春桥和吴法宪他们几个，汪东兴作用并不大，汪主要是联系主席那里。汪东兴病了是不是会议延迟的主要原因，我不太清楚，但他确实病了。叶群带我们去看过汪，之后叶群还叮嘱我们再去看汪。记得我们去看汪时，他不但很感谢，而且很激动，说着说着又哭又骂，什么“过河拆桥了”，“卸磨杀驴了”，“不要我了”……，江青没去看他，也没派人去看他；主席也没派人去看他，汪东兴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那个时候一切都敏感得很哪！汪东兴在我们面前敢对主席不敬，我们是很吃惊的，看来主席和汪东兴也有很深的私密关系，这在庐山会议上，得到了切实证明。汪东兴在“杨、余、傅”事件过后就和我们走近了，九大以后就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了。实际上，汪东兴也是脚踩两只船，其他人屡屡翻了船，汪东兴确实踩稳了，真是技高一筹。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了。

四月一日下午五时，毛主席主持了九大开幕式。

在选举了大会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之后，毛主席发表讲话。

主席说：“我希望我们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开得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接着，主席简单回顾了党的历次代表大会，说明党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对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二个代表，主席说：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董老（董老站起来，向大家致意），再一个就是我，其他好几个牺牲了，山东的王烬美，邓恩铭；武汉的陈潭秋，湖南的何叔衡，上海的李汉俊，都牺牲了。叛变的、当汉奸的有四个：陈公博、周佛海、刘仁静。还有一个李达，武汉大学的校长，早两年去世了。

主席特别讲到七大，认为七大开得好。主席说：七大是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清算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那时有人提议，不选王明路线的人到中央。我说服大家选了他们，团结他们。结果呢，有几个人表现不好，王明跑到国外去了，反对我们！张闻天不好！李立三不好！李维汉不好！（总理插话说，还有王稼祥），王稼祥犯了错误。其他几个，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这些人，那时不知道他们不好。对他们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从八大以来，现在搞清楚了。他们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比较清楚了。因此，希望我们这次大会，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在九大会议期间，毛主席特别强调大会要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以后则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定为九大的政治路线。这个口号无疑是对的，但主席正是在大大破坏了党的团结的情况下提出团结的口号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时，中央委员不过半数，这个情况主席当然知道，但主席并没有把大多数同志团结起来。

主席讲完以后宣布：“现在请林彪同志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

作政治报告也是一种象征，七大是主席作政治报告，八大是刘少奇，九大是林彪。

前面说过了，关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从撰稿人到《政治报告》的内容毛主席和林彪都有很大分歧，林彪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林总对张春桥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无论在起草过程中，还是在大会上宣读的时候，都没有增加或减少一个字。林总原来打算提议，把《政治报告》印发大会，他在讲话时对《政治报告》说几句相关的话就行了，林总同我们提及此事时，黄、吴、李和我建议一定不能这样做，林总经过考虑之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并下决心承担宣读报告的任务。

在大会上，林总与其说是作报告，还不如说是读报告，完全是照稿子念的。因为，林总事先根本没有看过《政治报告》的内容，所以念起来不流利，精神不振，完全是应付差事。回来后，林彪说我就是念得磕磕巴巴的，这是林总极为难得的调侃。

江青一伙在九大开幕式上的表演是充分的，中心意思是：我们是毛主席的亲信，未来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其目的没有别的，就是了为拉选票，他们的做法，对不明真相的人，有很大的欺骗性。

首先是出场、退场的问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出入主席台的时候都俨然是一副中央主要领导的神态，他们跟随毛主席、林总、周总理一起出入场，江青有几次是跟周总理并排入会场的。元老派则是跟在中央碰头会议成员之后出入会场。“左”、“右”两派划分得很严格。不仅如此，在江青一伙控制的新闻报道上，还特别发表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出入会场的大幅照片。

其次是江青搞政治投机，在江青的预先策划下，她抓住机会在主席台上同毛主席照了一张合影。后来据江青自己说是二楼的摄影师用望远镜头为他们两人拍下了“非常好的一张照片”。在九大开幕式的新闻报道的清样里，附有这张照片。发表这样的照片，周总理没有把握，但又不敢去掉，只好把《人民日报》的清样送给毛主席审批，毛主席看到清样后，用笔在照片自己的头上打了一个大叉，主席没有同意发表这张照片。

大会讨论和发言

开幕式之后就转入小组讨论，四月十四日下午又开大会。

毛主席主持了大会，他宣布：“今天的议事日程有三项：一是要通过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第二要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三、还有几个同志讲话。”

在十四号大会上发言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等人，他们分别代表军队、工人、农民、战斗英雄、革命干部发言。每个人的发言都比较短。周恩来总理首先在大会上发言，总理的发言主要就是两点：拥护毛主席，赞扬林彪。

总理发言以后，林彪有些坐不住，因为总理都是赞扬他的话，因此他即席发言。林总原来没有准备讲话，是为回答周总理的讲话而发言的，林总说：“总理的讲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党的胜利都是毛主席领导的胜利；任何人只要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拥护毛主席的领导，都能够取得成功的。在这里，还要指出一个问题就是不要学贺龙。如果贺龙还在的话，我的脑袋早掉了。在党的领导下，贺龙在湘西搞起了一点武装，就据为己有，对部队实行‘军阀主义’的统治。如果没有毛主席早就没有我林彪了。我们全党要永远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

陈伯达的发言最有水平，提到“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这在当时全党都头脑发热的时候，说出这样的话是不容易的。

康生的发言主要是说修改党章的问题，其内容等于是做了修改党章报告的摘要。张春桥他们在完成了政治报告的稿子之后，就以康生挂帅准备修改党章的报告。他们想争取康生担任修改党章的报告人。江青一伙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九大会议中更多的东西都揽到自己的名下来。九大没有安排人做修改党章的报告。在九大周恩来做修改党章的报告是合适的，但大会却安排康生做这样的发言，这样的安排，肯定跟主席的考虑有关。

孙玉国的发言受到了大会的热烈欢迎，大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当时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中苏边境可能会发生冲突，但在珍宝岛发生战斗则是突然的。我边防部队是被迫应战的。

孙玉国把珍宝岛的战斗经过，生动地在大会上讲了一遍。他的发言常常被代表们的掌声打断，会场上出现了非常热烈的景象。珍宝岛战斗的胜利，为大会增添了很多光彩。

当孙玉国讲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世界革命也一定是打出来的”时，毛、林彪、周总理带头鼓掌，他讲完话，毛主席当场问了孙玉国的年龄、籍贯、家庭等情况。

毛主席指着孙玉国说：“他叫孙玉国，是赵钱孙李的孙，王字上加一点的玉，国是国家的国。这次珍宝岛打仗就是他指挥的，打退敌人三次进攻。敌人打仗用了飞机、坦克、指挥车，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的战士除了一个副营长，都是没有打过仗的。这次破除了一个迷信，没有打过仗的，也可以打胜仗。苏修他们开的乌龟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乌龟壳把人的勇敢降低了。我们打仗靠人的勇敢，靠不怕死，靠林副主席的二百米硬功夫。三月十五日来了许多辆乌龟壳，五百米我们不打，一百米还不打。五十米来了，我们一开火，他们的乌龟壳就翻了。我们过去打仗没有乌龟壳，打胜了，还得靠人，靠步兵。乌龟壳我们有一点，但主要不靠他们。装甲兵司令来了没有？（林彪说：“装甲兵政委黄志勇来了，在下面。”黄站起来）我不是说不要装甲兵政委黄志勇了，也不是说不要吴法宪的空军了。是说还要靠步兵，靠二百米。要准备打仗。我们不打出去，边境上小打。可以放进来，给他些甜头，放进来后再打。”

大会发言之后，会议通过了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作的《政治报告》，《政治报告》通过后，毛主席很高兴，说：“都赞成，有希望了，通过。”大会审议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也得到通过。

毛主席谈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这期间，主席几次召集老同志、各大组的召集人、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开会。主席不厌其烦地多次讲话，这么上心，这么用心良苦，是少有的。虽然主席的开场白都是惯有的、满不在乎的调侃，但讲着讲着就讲到路线问题上，中心意思就是，从陈独秀开始，历届党的领导人都是不成的，都是错误路线。当时我们也听得津津有味，认为主席是无比正确的，主席是伟大的。主席的谈话距今已经三十年了，有些情景还历历在目。下面我不是按主席谈话的时间，而是按内容加以回忆。

第一次谈话是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下午，主席说：“会议已经开始了几天了。大家对大会有什么看法，这样开下去行不行？”

许世友说：“大会开得很好。大家在小组会谈得可热闹了！参加会议的人，心情都舒畅。”

毛主席又问：“今天在座的同志有多少参加过七大的？”

周总理插话：“参加过举手。”

毛主席说：“啊，人很少，除了当时就在中央工作的人之外，只有许世友、陈锡联、黄永胜、杨得志、邱会作等人（毛主席一个一个点名的）。当时是战争环境，很多人都在前方，打仗第一。参加过七大的人可以对比回忆一下，看看两个大会有什么主要的不同？”

我说：“最主要的不同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威望更加深入人心！”

黄永胜、陈锡联先后说：“我们大家都感到，我们的党所以能够这样有力量，同人民群众关系那样密切，党内上下那样团结，最主要的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威望深入人心！”

周总理说：“领袖的力量是无穷的！”

陈伯达说：“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的，所有力量就是从这里来的。过去没有好好宣传这个问题，我们做宣传工作的感到很惭愧！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应当归功于林副主席。”

许世友楞头楞脑的说：“好的要说够，坏的也不要隐瞒。我们党内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干部对造反派不满，有苦难言！所有老干部都吃了造反派的苦头。对这个问题，没有闹起来，就是所有老干部都听毛主席的话的结果。老干部并不反对文化革命，但都反对造反派！”

对许世友提的这个问题，没有人敢附和。

接着，主席像往常一样，都是扳着手指，把党在历史上的各次路线斗争，一口气讲下来，把每次路线斗争的主要问题，主要负责人和党受到的主要损失都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毛主席这样的讲话，都已经多次，因此，我听得很熟悉，也能理解。

主席说：“我们犯路线错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不从实际出发，只是照书本行事，或者搬用别人的经验。例如，在中央苏区反敌人第五次‘围剿’，提出保卫每一寸土地。好不好呢？但哪里保得住啊！所以路线问题，是起决定作用的问题。”

主席说：“我看党内最危险的主要有三次，一次是陈独秀的右倾，二次是王明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三次是刘少奇。其他都是局部的错误，如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彭德怀。张国焘是局部的，在军队自搞一套，张国焘以势力大小为依据，这是标准的军阀主义，他看四方面军的力量大，一方面军力量小，所以另立中央。搞两个中央就是分裂党，其实一方面军出发时力量也大。我们是为了党不分裂，团结张国焘，最后也只是他一个人跑了。罗章龙、张国焘都另立过中央，他们都没有搞几天。”

主席在谈话时提到党内三次“左倾”的问题，主席说：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还在世，他们和我们有一条口号是一样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又和国民党斗争。我们在土地革命时期三次“左”倾，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王明反李立三，说是三中全会搞得还不够，王明不是反他们的“左”而是反他们的右。一次比一次厉害，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

比李立三厉害，把红军搞得差不多了。李立三没有搞几天，主要是王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发生在党的创建时期。这时期党员不多，我们也没有军队。但造成了思想混乱，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界限模糊了，妨碍了党的发展，“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错误，以后主要是“左”倾了。中间党派有些可以联合的但没有联合，城市小作坊主，不该没收的也没收了，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有另外的作用，就是逼着一部分党员，在大城市呆不下去了，要“上山下乡”才能活命，才能发展。

王明的“左”倾，损失就大了。当时，我们有了大小不同的好多块根据地，有了几支相当大的军队；白区的党也发展起来了。这些都让王明送掉了。这叫做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红军被迫长征。他们都是用“左”的面目去纠正别人的右倾，所以越反越“左”。六届四中全会后更“左”了。王明的“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小册子就是为反李立三的“左”倾而写的。当时，红军总数十万，王明在莫斯科一指挥就剩下三万了，他也舒服了。

一九三八年王明由莫斯科回国后，就由“左”变为右倾机会主义了。当时党内有一种思潮，就是国共合作就不要独立自主了。什么“抗战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就成了这种思潮的头子。国共合作的民主潮流掩盖了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搞根据地。延安整风时，批判了“王明路线”，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

我觉得这次大会，总结这几年的经验，总之，没有刘少奇这伙人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存在着一个全党变修的问题。其前途就是亡党、亡国。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我们早有察觉，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看得更清楚了。还有两句，邓小平和刘少奇要有区别。邓做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一条是到北京后与刘少奇、彭真搞到一起。也有些好事，如苏联的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说打仗也不怎么样，但总打过些仗。

在主席的谈话中，他对刘少奇是不满意的。主席说：“除邓小平没有发现历史问题以外，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等都和国民党有一些关系。大革命时，刘少奇搞总工会，让工人纠察队向敌人交了枪。一九三七年三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刘少奇、彭真等不赞成。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请我们去谈判，开头是我去，没有结果就回来了。然后就是董老、总理他们去了。刘少奇在延安党校作了报告，说抗战胜利是‘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了，并向各地发了电报。我们按照七大团结胜利的路线，进城以后，把刘、邓团结起来了。”看来毛主席对刘少奇的问题，是了如指掌的。

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把刘少奇开除出党了，我本以为九大时要追认一下，毕竟刘少奇是党的副主席呀，但九大没有这个议程。

主席说：

朱（德）、陈（毅）是经历过中央苏区的斗争，吃过苦的，三次反围剿帮过忙的。现在选他们当中央委员困难，许世友说朱、陈反我反了几十年，其实有时也不反。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他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篡夺了军权，但心里不踏实。陈毅到上海向中央请示，受到了批评，中央批评他们是极端民主化。陈毅又请我回军队了。我不是又“复辟”了嘛！项英夺了军权，不会指挥，要请外国人指挥。至于王明没有搞过一个根据地，没有打过仗，农民运动也没有搞过。那时“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吃得开，我们这些人都是右派。项英一个时期没有转过来，直到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才授受教训。在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不能不利用他们，不能不限制他们，也不能不改造他们。对待富农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我们要学会历史地看问题。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是个复杂的问题。只联合不要斗争是右倾；只斗争，不要联合是左倾。大革命时期在武汉，刘少奇、向忠发、项英、李维汉就只讲同国民党联合，国民党的代表人物就是蒋介石、汪精卫。蒋汪叛变了就不要联合了，打倒一切！

第二天继续谈路线问题，毛主席说：

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是开成了团结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之后，确实团结起来了，比

中央苏区，内战时期更加团结了。七大时还有几个人联名写信，不选王明他们，我说要选他们。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犯错误的人，我们不在大会上批评他们，事先把他们的问题给大家讲清楚。他们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但在苏区吃过苦的，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围剿帮过忙的，其实他们在苏区与朱德、陈毅差不多。七次大会，王稼祥，王明都落选，是经过做工作第二次选举才选上的，这种团结，是在正确路线之上的团结。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时，还在打仗，没有机会同大家讲，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刘少奇他们还是讲利用，不讲限制和改造。

主席在会上讲：要把朱德、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等老同志选进去。这当然是很好的，当时我就认为团结的人还不够，那个时候主席说什么就是什么，主席说到邓华，邓华就是中央候补委员，再能多团结一点人就好了。如李志民、胡耀邦等人都参加了八届十二中全会，选进来应该是可以的；再如张闻天、王稼祥这些人，主席也挂在嘴上好几次，最终还是没有把他们选进中央委员会。其实他们在党内早已没有太大的影响了，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也都是继续革命努力奋斗的。选进来主席威信会更高，这的确是一种遗憾。

毛主席谈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

毛主席说：

文化大革命同四清运动的不同点是：四清运动主要是搞基层，搞经济基础；文化大革命是搞上层建筑，搞反修，也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现在基层怎么搞，只提出了“斗批改”，但是还没有落实。

搞社会主义，比打仗困难多了。搞建设实在不容易。社会这个东西，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是违背不得的，它老大得很，不管什么“主义”管它，一概不理。要是违背了它的发展规律，是要受惩罚的。我们把制度和办法，总死死捆在一起。比如，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坚持，这是对的。但我们共产党办事很蠢，把老百姓的百分之八十都包起来，只让他们自己搞百分之二十，结果是包而办不好。我看要把它倒过来。老百姓百分之八十的事都由他们自己来办，我们只包百分之二十就好办了。

到九大的时候，“天下大乱”的时期基本过去，“天下大治”的阶段应该到来。主席还是反复讲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斗批改”中，要注意防止扩大化的问题。主席说：

“斗批改”是中央提出来的，下面一搞就扩大化了，这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一个倾向，我在碰头会上谈过好几次了，清理阶级队伍是要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现行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找出来，要搞这样一些人。有些地方搞得好，有些地方扩大化，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但要引起重视。

主席说：

我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的时候，就提出了清理阶级队伍要“稳、准、狠”。“准”是最主要的。有些专案组的材料不一定准确，这个问题要注意，搞专案的人总想多搞几个才好。好像过去我们行军，没事捉虱子，总想多捉几个，专案组好像捉虱子，要超出一点好说话。一个大学捉了九百多人，怎么得了？人关起来了，捉有捉的理由，放更要有个理由。至于关在牛棚里的人更不少，恐怕各地都有。……苏联人讲我们整知识分子，王明在莫斯科发表文章说我们不要知识分子。秦始皇杀了四百几十个人，我们比秦始皇好一点，没有杀，搞喷气式，戴高帽子，游街，扫厕所。喷气式也不要搞，我们不主张戴高帽子。我说罪魁祸首还是我。我在十二中全会上讲了：我在一九二七年文章上说了，地主戴高帽子游乡，既然给地主可以戴，为什么不可以给彭真戴？给牛鬼蛇神戴？我们几十年没有搞了，这次红卫兵就翻出来了，搞这一套。抓人还是大部不抓，抓了怎么办？还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嘛！现在扩大化了，

许多同志要注意。想到我们党的历史，总是在主要倾向掩盖之下，另外一种倾向就忽略了。

主席讲到文革时特别强调说：

文化大革命是二次革命，叫文化大革命。叫文化革命也可以，因为是从文化开始的。不管叫什么名字，触及上层建筑，中央机关，到学校、工厂。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恐怕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这次文化大革命，由历史作结论。

各个时期都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要使同志们了解我们党的历史，以免犯错误。现在有一种相当普遍的倾向就是，不仅没有预见，事情来了不考虑，总是尿急了挖厕所，没有不出事的。北京有个单位九千多人，抓了九百多人，十分之一。把人抓起来，不容易放，要放就得讲个理由，为什么抓我，又为什么放我。抓人容易，放人难啊！对有的人，关在“牛棚”里，长时间无人过问。知识分子，打扫厕所是可以的，但长期无人过问就不好了。我们现在搞的“三支两军”又使军队与群众融合了。

主席在谈话中提到很多同志及这些同志主管的部门和地区，如李雪峰、谢富治、韦国清、杨勇、郑维山、陈先瑞、许世友等很多同志。我感到毛主席是认认真正在搞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像邓小平他们把毛主席在文革中说得一无是处，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无是处。主席说：

这场文化大革命，一方面群众中有无政府主义思潮，一方面有人乘机破坏，打倒一切。我看这都无关大局。武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几万人武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有人认为军队稳不住了，其实没有那回事，军队很巩固，文化大革命稳坐钓鱼船。军队本身也有派性，野战军，地方军各支一派，如保定、四川、贵州、云南都是如此。对这些同志，过去搞了武斗，现在应联合。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必记仇。

将来有些干部犯了错误群众谅解就是了，有些抓住不放，比如杨勇。当然他也有错误。是哪里的命令？至今我还不知道。（江青：几个老师下的命令，叫郑维山执行的。他们倒打一耙，嫁祸中央文革，我们哪里能下命令抓人呢。）萧华是有问题的，他在山东的问题现在是红卫兵搞出来的，原来中央知道的不是那回事，叛徒是肯定的。杨成武也有问题，不过他没有历史问题。余立金不仅是皖南事变本身的问题，主要是到了上海自首的问题。杨、余、傅，杨、余大一些，不过傅也不是老实人，不讲真话。

对清队问题，主要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把政策落实，要干一年左右，大家都要亲自抓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机关。工人宣传队，军队宣传队都不能压群众。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是压倒一切。反对军代表，就说别人反解放军，反工宣队就说别人反工人阶级领导，这是不对的。对问题要实事求是，不要随便扣帽子，对提意见的人可以做工作。现在有些谣传很厉害，只要在街上看到贴了谁的大字报，就说某某人打倒了。去年有人要打倒张春桥、张国华，打了半天，他们还在这里开会。

毛主席谈关于选举的问题

毛主席说：“我建议有几个同志都选进去，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徐向前、李先念、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王明大家不会选他了。王稼祥犯过大错误，他是王明‘左’倾路线的积极支持者，但也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的。这些人选进去，多他们不多；如果留在外面，少他们就会显得少了，我是赞成选他们的。”

毛主席指着一份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名单说：

这个名单很难排。有的同志参加了会议就榜上有名了，没有参加会议的就名落孙山，例如，北京军区有六个军，来了一个军长参加会议，名单上排上了，有的参加了省革命委员会，也排上了。没有排上的也不一定比排上的差。排上的也不一定个个都那么好。人们都说，办事要公道。什么是公道，只有天知道！在名单上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为什么要这样分，我讲不出来一个道理来。

从工厂、农村来的人，选上了中央委员的，也要回原单位去，不要脱离劳动。有人提出，

新走上政治舞台的人，不要在中央，就要在基层。基层是马列主义大学。

张闻天、王稼祥没有排上，值得考虑。在名单上排上的人，也有人提议要拿下来，我看还是要选他们。（许世友插话：他们反毛主席几十年还选他们？）反几十年难说，有时反有时不反。比如彭德怀是反对我的，但反张国焘和我是一致的。陈昌浩拉彭德怀没有拉过去，这应是他的一功。当时，如果彭被拉过去了，就剩一个一军团了。我们北上肯定的，只剩一个军团，也是会北上的。这里还提一下叶剑英这个人。叶在历史上有二功：广州暴动和张国焘分裂红军。在草地，如果没有叶剑英把张国焘的密令搞出来，我们大家当了俘虏，还不知道是啥事呢。

那些反过我的人，要选他是困难的，要你许世友投他们的票也是困难的。那些人，资格很老，功劳也有，错误不少，有的还犯过大错。他们的检讨也有，但群众不通过。我看以后就不要检讨了，主要看行动。我们看他们的行动，他们也看我们的行动。（许世友插话：毛主席下命令，我们就选他们）那不行，只能说服，不能压服。

党的七大时，我们要选王明，王稼祥，他们不信，我们真的选他们了。我们选了王明，后来他又跑到莫斯科去反我们，这并不是选错了。我们要不先选他们，可能早就反了。他们继续反，是为自己做了结论，大家都看清楚了。选一些反对过我们的人，不要紧，只要大多数是好的就行了。党内总会有矛盾的，中央委员会也有矛盾，没有矛盾的事是不存在的。

上海帮批判陈毅

在大会期间，上海代表团对陈老总进行了多次批判，大会选举的头一天晚上，还进行了通宵达旦的批判，这与毛主席批“二月逆流”和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对陈老总错误的批评，是有密切关系的。文革中批判“二月逆流”，主席对陈毅批判的话也确是说得过重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挖苦陈毅是右的代表也是十分错误的批评，九大没有把陈毅留在中央政治局里也是十分不妥当的。陈老总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灾难，主要是由毛主席对陈总的态度所决定，几十年前的恩怨，主席嘴上说不计较，实际上心里还是没忘的。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晚，上海代表小组在京西宾馆会议楼第一会议室开小组会，会议从晚九点开到凌晨五点。我看到陈总的随行医生，才知道陈总在开会，我先后进去了两次，都向他们提出过：“陈老总是个病号，三〇一医院是要对病号负责的。”王洪文还同我开玩笑说：“我们也会照顾病号。”

上海代表小组的会已经开到凌晨四点多了，我只好向总理报告了，总理接到我的电话，感到很惊奇，并说：“真有那样的事吗？你去给王洪文同志打个招呼，做点工作，我马上去。”

这样我即进去向王洪文说：“我受周总理的委托，对陈老总的健康是负有责任的。你们的会已经开了快八个小时，一个病号能受得了吗？会出事的。”我向王洪文谈这番话时，陈老总看着我几乎要流出泪来。

王洪文把我拉到会议室外边说：“江青同志和春桥同志指示，陈毅这个人很顽固，对自己的错误基本上不承认，更使人气愤的是他发言名为自我批评，实为教训人。明天就要选举了，他选上了中央委员，又会尾巴翘起来的，这点事就不要干扰总理了。”他回会议室继续开会。

不久，周总理来到会议楼休息室，我向他简单说了一下情况。总理对我说：“我们不要指责他们，只设法把陈总送回去休息就是了。事情很复杂，一句话说得不好，都可能出事的。”

周总理同我说了几句之后，就把王洪文、陈老总都叫来了。周总理当着王、陈的面若无其事地对我说：“邱副总长呀，我肚子饿了，想吃东西，还有他们两个（指陈、王）也一起吃一点，搞点东西吃。”

陈老总一只手捂着肚子，向总理说：“我不必吃什么东西了，我这就回医院，好吗？”

总理只是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我把陈老总送上电梯去了。

陈老总走后，王洪文要向总理说明为什么这样开会，总理都用别的话堵住了他的嘴，没让他说下去。王洪文不理解总理的意思，还要嘟嘟囔囔地讲。我就直截了当地向王洪文说：“你不要说了，总理是到这里想吃点东西，并休息片刻，总理的脑子早就装满了，你再说也没有地方放了。”我说了之后，三人一起笑了起来。此时，夜餐送来了，王洪文也没有说话的机会了。

江青要当接班人

大会将要进入选举之前，江青向林彪进行了一场“艺术性”很高的战斗。一天，大会秘书处通知，江青要在京西宾馆举行一次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人选，姚文元早已布置好了：每个大组派五个人参加。姚文元是座谈会的主持人。因为军委办事组承担了会务工作，我断断续续地进入会场听到了一些讲话和发言。

座谈会开始时，姚文元首先讲了话。他说：“今天江青同志召集部分革命造反派代表开座谈会，是很有意义的。江青同志时刻都关心革命造反派的进步和成长。现在请敬爱的江青同志讲话。”这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会场上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在掌声中，江青开始谈话了。

江青说：

我是一个不宣传自己的人，我也不同意别人宣传我。大家很清楚，对我的宣传就使人把我与毛主席联系在一起，所以就不能随便说。今天在座的都是我的战友，我有责任向你们简略地讲一下我的历史，除此之外，我今天准备向战友们讲三个问题（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问题；（二）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问题；（三）要有一个无产阶级战斗司令部的问题。

关于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问题。全会把刘邓的问题端出来了，刘、邓是不可能再担任当时的职务了。林副主席接班，毛主席是有个考虑过程的。一天，毛主席对我说，谁来接替刘少奇的工作，你有什么想法吗？我一时不敢回话。在毛主席再三问起之后，我才敢大胆回答毛主席的问题。我向毛主席说：范围不超出现在的中央常委，但要有三个条件：一是历史上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人；二是一贯同毛主席亲密合作的人；三是要有相当的马列主义水平的人。我说了之后，毛主席笑着说，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人了。我有意让主席散散心，即说：“那好，现在我们把考虑的人各自写在条子上面。”我们都写了一张条子，互相看了条子之后都笑了。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就是我当年同毛主席一起提出来的。

关于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问题。在十二中全会上，担任主要讲话的人（没有点林彪的名字）对文艺复兴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对这样的问题，我是顾全大局，维护中央领导同志的崇高威信的。我不想出来公开反驳那些不正确的观点，只是想经过一定的工作，使讲话的人懂得错在什么地方，并自己出来纠正，我的态度是善意的。这里，我还要指出的是，我的讲话引起了军委办事组对我不公正的看法，对他们我同样是不做公开声明的。对这个问题，我把所采取的态度向毛主席报告了，主席对我是很赞扬的。

关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我们的大会很快就要进行选举了。我的愿望是能选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这就是说，这个司令部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又是在毛主席指挥下，能够进行战斗的司令部，这是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大问题。

什么人可以到这样的司令部里呢？我看最关键的就是对文化革命的贡献问题。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开创了这条路，就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我们就是要理直气壮把对文化大革命有功的人都要选到中央委员会去，选到中央政治局和党的核心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里去。我们的江山是革命造反派从修正主义的手里夺回来的，保卫我们的江山就历史地落到革命造反派身上了。

毛主席的接班人，应该不止一个，我们要把毛主席最信任的人都选到核心领导里去。只

有这样，才能把毛主席的班全面接下来。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也决不止是一个人，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了。

江青讲话之后，姚文元接着讲了话。他直截了当地提出，江青同志也应当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他说，我们在党章上，虽然只写了一个接班人，江青同志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是当然的接班人。

姚文元把江青讲话的记录整理好，就送给康生了。康生边看边冒大汗，他把记录留下来，再没有转手。但记录以后怎样处理的就不知道了。后来在简报上看到“江青同志召开部分代表座谈会，对到会代表鼓舞很大”。

军委办事组退选举名额

在九大期间，军委办事组和中央文革对选举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央文革要控制选举，军委办事组则坚决反对。

毛主席对选举问题的指示，前前后后所说的有三个问题。

第一，历史的必然问题。

毛主席说：我看凡是正式党员都可以当选。当然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是优秀的，但没有选进中央委员会的，也有很多优秀的同志。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肯定反映文化大革命这个时代的特点。这也是一个历史必然的问题。

第二，老中青结合的问题。

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一定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各级领导班子也要实行这个原则。老中青三种人，在中央委员会大体上要各占三分之一，老的不能不要，像我们这些人就算老的了。中年的在党员中占主要成份，青年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对这些人好好培养出来就是未来的希望。对青年的培养主要是在基层。那些人要是离开了基层，也就可能成为废物了。

上次我们在各组召集座谈会上，谈到的那几个人还是要考虑的。比如朱德、陈毅，他们两人是不分上下的，南昌失败后，从广东到井冈山，能够把剩下的人带上山，只有朱德是不够的，陈毅出了很大的力量。在历史上，朱、陈是分不开的。现在我们要朱德，也就不能不要陈毅了。

第三，选举自由的问题。

没有自由权就不叫选举，而是奉命行事。我们不能搞那一套。拉选票，这是古来有之。资本主义社会，主要靠金钱。我们共产党不搞这套，也搞不起呀！谁能用钱买选票？我主张在选举之前对候选人要多讨论几次，让代表有充分的发言机会。但我们的民主，是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

毛主席对选举问题，从原则到具体说得清清楚楚的。本来是照着执行就是了，但江青一伙还是另搞了一套的。在下列问题上，都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江青一伙的所谓选举方针。江青在中央碰头会上，以“学习”毛主席对选举问题的指示为名，对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了肆意的歪曲。江青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就是革命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革命造反派当权是根本问题。没有革命造反派就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成功，也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的指示最中心的问题就是肯定革命造反派的地位。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也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因此，在九大的选举的问题上，如何对待革命造反派就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就是对待毛主席的态度问题。

江青他们看到候选名单上还是老同志占优势，大为不满。她说：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央委员会，应当是朝气蓬勃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把基础打好了。

对这个问题还是康生比他们高明，康说，中央委员会应当有许多老同志参加，要是没有那些人就不是中央委员会，关键是权力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里，争中央委员会的名额是只图虚名。康生这一席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江青一伙最后还提出了别人说不上口的问题。江青说，在选举中保证中央文革成员有足够的票数，所以做好预选工作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威望问题。我提议中央碰头会议应召集主席团开大会，说清楚这个问题。

周总理“啊”了一声说：“中央碰头会议还能召集主席团开会？”但总理马上又缓和下来：“我们应当开一个主席团大会，专门说下有关选举的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中，代表中央办事的就是“中央文革”，代表中央军委办事的就是“军委办事组”。这两个“小组”的意见常常是对立的，当时，还没有另外的任何中央一级机构可以与中央文革对立。国务院的业务组，名符其实，只管“业务”。从一九六八年三月杨成武下台之后，黄永胜上台，军委办事组同中央文革就“貌合神离”了。对九大选举问题，军委办事组对江青一伙提出的谬论，都进行了抵制与斗争，我们对待中央文革的办法是很多的。其方法有的是直来直去，有的就照我们“自己的办法”行事。在代表的总数中，军队代表占三分之一以上，如加上各省市的军管干部，数字就更大了。军委办事组提出的选举条件就是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和老中青三结合，坚决反对把造反派作为选举条件的观点，对大会震动很大，对整个选举起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坚决主张多一些老同志参加中央委员会。老党员不仅过去有功，也是我们今天的需要。中央委员会没有部分老同志参加，就不能反映我们党的光荣历史。对老同志有些不公正的看法，必须澄清。老同志中，对造反派搞打砸抢，揪斗老干部是反对的，对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的胡作非为也是反对的，但这决不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也不是反对毛主席。

军队安排中央委员会的原则是三条，一是现任职务。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种、各兵种的军政首长，都是考虑的“当然”委员；二是资历。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的副职和军事院校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是被考虑之列；三是才能。除上面所指的正副职干部之外，有些比较有才能，有发展前途的干部也是被考虑的。为了慎重起见，军委办事组召集各大军区，海军、空军，各总部的有关首长，进行了几次会议，除了一致同意上面的三条原则之外，对所提名单也是逐个通过的。

周总理在各大组的会议上，让军委办事组首先介绍了他们在部队系统推选候选人的做法，各省市负责人也一致同意军委办事组的做法。最后，周总理肯定了军委办事组的做法是正确的。各省市的负责人也提出各省市的候选人由自己提名的要求。这样就打消了江青一伙企图垄断提出候选人的特权。

江青一伙对军委办事组提出的产生候选人的做法很恼火，她问周总理说：“难道各省市革命造反派优秀人员的名单也由军委办事组提出吗？”周总理直截了当回答说：“这个仍由中央文革提出来。”江青一伙得到了满足，他们也就不说话了。

中央碰头会议，对中央委员的总定额，经过反复考虑定为二百多人不到三百人，对总定额又进行了具体分配。军队的定额不到九十人。但不包括担任各省市第一把手的军队干部。这样实际上就超过了三分之一以上。军队占有这样大比例的中央委员数额是空前未有的，各省市根据大小不同，分为三等（具体数字记不起了）。各省市除了干部之外，都要有工人、农民参加中央委员会，毛主席批准了这个分配原则。

军队中央委员的总额在安排上进行了多次反复研究安排，但按上面所定原则名额用不完。各军区、各军兵种首长也再三表示，完全满足了要求，不能再安排了，他们说：如果再安排一个就会产生连锁反应，互相攀比，影响一串。经过反复考虑，有的军区只是多安排了一两名，有几个人的名额和四名战斗英雄（陆军两名，空、海军各一名）就是在这种精神之下打破常规安排的，但名额还有多。在军委办事组的会议上，有人提议，把名额退回中央碰头会议，我向黄永胜挤了挤眼睛说：“名额先不退回去，还是我们自己掌握为好，不然冒

出来需要安排的人，我们就被动了。”当时如果把名额退回去了，江青他们就会把名额抢走，中央委员会中的造反派就会增多。黄永胜完全领会了我的用意，他说：“不够格的不能往里塞。先把名额按住，等到这个工作结束时，我们再把名额退回去。你（邱）去同总理说一下。”我去同总理悄悄讲时，总理笑了，他说：“好呀。但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预选是以各大代表组为单位进行的。西南大组在京西宾馆会议楼一层东厅举行。中央碰头会议成员分别参加各大组的预选，周总理、江青参加西南大组的选举。周总理、江青得了全票，西南大组的预选是我主持的，江青得全票非常高兴，选举结束时，再三向我说：“今天的预选工作组织得很好，你的组织工作能力很强。”

西南大组的预选前后只有一个半小时，江青在这段时间内，演了三出小“戏”。一是进场时同全体代表每人握手、问好；二是选举开始前发表了简单的讲话。她说，我很忙，没有时间来看望大家。今天利用这个预选的机会，我代表中央文革向大家问好；三是选举结束时又去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她说，从今天的预选结果来看，我们代表的思想觉悟是很高的，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大家一致把中央文革成员选到中央委员会的深厚阶级感情，我是很感动的。

温玉成在中南大组，得到略超过半数的“保证票”。他在选举后连家都没回，跑到京西宾馆向黄永胜告状。他说：“今天在中南组预选，李作鹏压了我八十票！”黄永胜若无其事地说：“他顶多能压你一票，为什么能压你八十张？”温又说：“我要求把我的名字，从预选名单上删去！”黄又说：“删去不好，你不能意气用事，江青同志不会同意的。她对你是非常欣赏的。”

温又说：“啊！是这样一回事呀！她越欣赏，我的票越少。”

黄开怀大笑说：“辩证法，辩证法。”

大会选举

主席在九大时，将党内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讲得很重，已经离开政治舞台的且不说，就是参加会议的朱德、陈毅等老同志，主席也是口没遮拦，年轻人（多数是造反派）听了很新鲜、很激愤。我们这些人，尤其部队的同志听了，往往不知所措。但是，主席又强调把老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根据毛主席既要保证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徐向前、李先念、陈毅、聂荣臻、叶剑英这些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的指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作出规定：批归批，选归选，这样才能使这些人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总理分头找人谈话，也贯彻这个精神，告诉各大组的负责人，工作一定要过细，哪些人投同意票，哪些人投不同意的票，都要落实到“人头”，预选时这十位老同志都过了关。但是总理还是不放心，二十四日下午正式选举，上午总理专门召集了主席团扩大会议，特地讲老同志要当选的问题。总理说：老同志有错误，不论是文革中还是历史上的，都应批判，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团结、批评、团结”的教导也要把握好，特别是这次大会要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首先要在党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些老同志，可能对自己的错误有个认识过程，我们就一批、二保、三看、四帮吧。

散会后，总理把我们几个留下，心事还是很重，自己轻轻拍着脑门，沉思很久才说：“下午就要正式选举了，有把握吧（指老同志当选）？”我们说预选通过了呀。总理说：“不见得稳固！青年人不懂得党的历史，不懂得大局观念，吹一股小风就垮了。你们都是老同志，军队的同志原则性强，办事组的同志威信高，你们马上给部队和你们熟悉的老同志再打打招呼，要投那几个人的票，不然时间就来不及了。”

吃午饭时，黄、吴、李和我不仅给总参、总后、海军、空军、广州军区的老同志代表打了招呼，我们也给自己的老战友打了招呼。黄永胜专门叫了袁升平，谈完以后，袁升平开玩笑说：“哦，原来不是给自己拉选票呀。”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选举。

全场设有五个票箱，台上一个，台下四个，投票开始了，毛主席第一个在台上的票箱投票，按照排列，第二个，第三个应当是林总，周总理。但江青在投票的时候，又借机出一个小小风头，江青看到毛主席起身投票时，她也站起来了，江青待林总走到自己跟前时，她迈进一步就跟在林总后面了。周总理完全知道江青的习性，还是让她在林副主席的后面投票了。

投票结束之后，大会休息了约二十分钟。接着在大会工作人员监督下宣布选举结果：一、大会主席团提出的候选名单，全部超过半数以上的票数都当选了；二、毛主席以全票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三、按照以姓氏笔划的顺序，每人得票多少都公布了。

毛泽东以全票当选。林总少两票，林彪为了表示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他自己和叶群投了反对票。周恩来少一票。前面提到的十位老同志全部当选了。从文革开始，到八届十二中全会，再到九大，主席把这些人的脸皮扫尽了。主席认为把他们选进中央委员会，他们会感谢主席的，其实正相反，彼此结下很大的怨恨，主席去世以后，邓小平等人否定毛主席的时候，这些人谁也没有站出来为主席说话。

公布选举结果的时候，江青一直在比较注意听，当宣布到她自己的票数时，她停了一小会即退席了，以后再也没有出场，因为中央文革的人得票情况并不佳。江青可能少了八票，张春桥，姚文元各少十余票，而且有人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上打了“X”，江青知道后大为震怒，说谁在她的名字上打叉谁是现行反革命。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得票的情况比他们好，温玉成可能是少了几十票。

选举结果宣布完之后，林总站起来宣布，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在文化大革命中期举行的这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国际歌声中闭幕了。

九大闭幕时给我留下三点难忘的记忆。

一，上海帮的愤怒。散会的时候，张春桥、姚文元、温玉成等人都是低着头跟着向外走，他们不像往常那样，昂首到处张望。在九大选举时，江青一伙全部当选为中央委员了，但没有一个得全票的，特别是江青没有得到全票，他们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

二，高级干部的言论。九大期间，主席团成员进出大会会场，都由大会堂东门出入。大会闭幕后，我同萧劲光、粟裕等一起缓步向东门走去，我们几个人，边走边闲谈起来。我说：选举的中心问题是当选与落选的问题，多几票少几票毫无意义。粟裕说：对一般人毫无意义的，对特殊人意义就大了。

三，代表的热情。九大的代表，自始至终都保持着饱满的热情。会场总是表现的热气腾腾的景象，对毛主席，几乎每个举动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散会时，不少代表走到会场的主席台前，要仔细看看毛主席的容颜。毛主席也站起来，数次向大家致意才离开。

在大会闭幕的当天晚上，中央碰头会议照常进行。四月二十五日凌晨黄、吴回到京西宾馆。黄永胜把中央碰头会议的详细情况都向我们说了，他说，对选举问题的最后解决就要看毛主席的态度，我们同他们（指江青一伙）又多结了一个疙瘩。但一反常态的是，在会上唱主角的是张春桥，帮凶是谢富治，江青反而情绪和悦，基本没有说话。

张春桥说：“选举中，有人捣鬼。要彻底查个水落石出！不选江青的人，决不是小代表是大代表。这不是少选票的问题，而是一种见不得人的政治斗争。”

温玉成在张春桥提出问题之后，唱了很高的高调。他说：“不投江青同志的票的人，数量虽然不多，但看出了严重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是新的修正主义向无产阶级进攻。从大会的选举可以看出，同修正主义斗争是长期的斗争！”

姚文元说：“同意彻底查清选举中的问题，在中央碰头会议也可以来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

周总理向坐在他旁边的江青说了一句话：“你说几句吗？”

江青：“我是受害者，不说话！”

康生接着说了话，他说：“要查选举中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问题。毛主席指示，选举自由。另外，我们实行的是无记名投票，无法调查，这个问题，要向毛主席报告，经主席批准才能查。这里还要顺便说一句，什么新修正主义？这是美国共产党加在我们头上的，我们不要去搭理，更不要引用。”

陈伯达：“康老说得好，我们不懂的问题不要自以为是地信口开河。”温玉成本来是要唱高调来效忠江青的，江青又不说话，这就够他难受的，又遭到陈、康两位理论家的批评，心里就更难受了。

周总理：“我完全同意康老的意见。不要斤斤计较票数的多少。此事，由汪东兴先报告毛主席。在必要时，我还会向毛主席汇报。”

江青一伙对选举问题表现出来的愤怒情绪，使黄永胜略有不安，他对着李和我说：“可能惹祸了，你们看出来没有？”

吴法宪补上一句话：“本来就不应当去搞那些事。”

李作鹏一下生气了，用一种很粗鲁的语言说：“在暗角里说话，嘴巴邦邦硬，现在又屁股稀松松！”

我也说：“别人少了选票。我们担忧什么？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的话是有意给黄永胜壮胆。

黄永胜说：“不要埋怨人，也不要讽刺人。好汉做事好汉当！”

江青一伙提出要查选票的事，周总理还是向毛主席汇报了，并得到了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要查选举中的问题，就让他们去查吧。我是不参加任何人违犯党章的大合唱。”这样，事情算是最后了结了。

四月二十五日下午，我因工作的机会同周总理见面，总理对我说：“你回去同黄、吴说一下，选举中的问题，主席有指示，已经解决了，不要有什么担心。原则问题你们要坚持，在些小的问题上，常常会被别人抓住辫子，要吃大亏的。军队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一致的，这次关于选举的问题就有人同我写了一封信，揭露了这个问题。但信是写给我的，可以到此为止。”我将总理上面说的情况，同黄、吴说了，并建议他们两人在顺便的时候，向总理说一下在选举中的问题，他们同意我的建议。

江青这个人也不是处处胡闹，对选举问题，她不仅不表态，还在知道了毛主席的态度之后，反转来对张春桥、姚文元不指名地进行了批评。她在二十五日晚上的中央碰头会议说：“在选举的时候，产生了一点小小的问题，有人过于重视了，这有什么必要。至于有的人提出，不投我的票是大代表所为，这事是毫无根据的。”

张春桥指的不投江青的票是大代表所为，就是指的军委办事组。江青对选举问题似乎是“公道”的。这是为什么？原来康生早就同她说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康的意思是：一中全会的选举才是大问题。江青对康生，基本上能做到“言听计从”，对大会选举问题，虽然痛恨在心，但也忍耐下去了。

三人小组

四月二十五日晚，军委办事组正在开会，汪东兴来电话通知：主席要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立即到中南海主席那里开会。主席召集周、康、黄开会，并不新奇。但九大刚闭幕，一中全会还没有开，新的政治局尚未产生，这样的会就不是一般的会了。黄去开会之前，黄、吴、李和我在一起议论了一会，我们各谈了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我们正在谈得热闹的时候，叶群来了。她一进门就笑笑地对着黄永胜说：“你要去参加组阁了。”她又说：“今天你们要开的会，十一楼根本不知道。怕她干扰组阁工作。今天的会议主要是谈准备一中全会的问题。可能把政治局的名单初步定下来。”

叶群接着说：“林总说，这届政治局的组成，比以前都困难。主要是要上的人和可以上

的人太多了。”

黄永胜刚要出门，林办来电话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要到京西宾馆去。”叶群为了回避江青，她从后门走了，黄说：“我也走。”

江青来了之后，一看黄、叶都不在，就有点心不在焉了，除了问黄永胜、叶群的去向之外，就谈了几句，她说：“现在大家都是中央委员，这是革命的成果。一中全会就要开了，要产生中央政治局，也就是要产生一个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关于组织中央政治局的一些原则问题，毛主席已同我商量过，具体情况，现在就不谈了。”

黄永胜开会回来，详细给我们介绍了主席那里开会的情况：林、康、周、黄四人几乎同时到达了中南海毛主席住处。毛主席首先说了话，他说：“一中全会怎么开法？我看全会没有别的议题，就是选举中央政治局。选举政治局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走群众路线，由下而上的办法，不提名单，只提一个数目范围，这个办法叫民主，但这又要时间；二是先搞出一个名单出来，为了避免个人独裁，还是由恩来、康生、永胜三人先商量一个名单出来。我同林彪同志不参加你们提名单的工作，我们两个是幕后。”

林总说：“对政治局人选的方针，原则请主席指示，以便有所根据。”

毛主席说：“那只好叫独裁，那我们还是五人独裁吧！”

周恩来说：“一中全会，大约在什么时候举行？”

毛主席说：“这个月底之前，‘五一’好上台。”

周恩来说：“政治局委员多少人，请主席定个数字，这对考虑人选有密切关系。”

毛主席说：“我看政治局委员，可以定为二十五至三十人，多了更难安排，平时开会也不方便。”

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的三人小组，这样就算正式成立了。这个小组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直接领导下执行一中全会的筹备工作。

黄永胜坚决不当常委

三人小组接受毛主席的委托后，立即开始工作。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内，几乎同外界不产生任何关系。周总理交代：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电话可以接之外，其余任何地方的电话都不准接。

一中全会之后，我同黄有过一次闲谈：

邱：“周、康、黄三人受命组阁也即是党政军联合办公吧？”

黄：“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这是参与毛主席决定的问题。四月二十四日大会闭幕后，毛主席决定：由周、康、黄组成三人小组，先拉出一个政治局委员、常委的名单。”

邱：“你这个军委办事组长参加了，为什么中央文革没有人参加呢？”

黄：“康生事实上是代表中央文革的。”

邱：“你参加了‘组阁’工作后，我们曾经议论过，你将是中央常委之一。”

黄：“这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曾经定了七个人的名单：毛、林、周、陈、康、黄，还有江青或张春桥等七人。但是我推掉了。”

我真是有点生气，忙问：“为什么呀？”

黄爽快地说：“那么多老资格，人家会戳你后背。另外，我当了江青也会闹着当，因此，我不当也不能让江青当。”

黄说，政治局委员名单的产生是有个过程的，每走一步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第一步，号称工作名单。这个名单不怕大，对需要考虑的人力求一个不落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是当然的啦，其他人，一是上届中央政治局没有倒台的老人：陈伯达、康生、朱德、陈云、董必武、陈毅、刘伯承、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徐向前、聂荣臻、李雪峰等人。二是中央文革成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三人。三是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

李作鹏、邱会作、温玉成等六人。四是各大军区和军种，各省市和中央机关可以考虑的人：萧劲光、许世友、陈锡联、汪东兴等。

第一次上报时就没有温玉成，总理和康生对他印象都不好，我没有吭声。康生提了王效禹，总理和我也没有吭声。我提了汪东兴，总理和康生也没有吭声。这个上报的名单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董必武、朱德、刘伯承、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许世友、陈锡联、汪东兴、叶剑英、谢富治、李先念、李雪峰、王效禹等二十三人。这是一个比较主动的名单，这个名单同毛主席提出的定额二十五至三十人相比较，还有比较大的变动余地。

黄还说：我开始一点也不摸底，我表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应讲功劳，但不一定要当选政治局委员，这是为了主席，为了大局。康生一听我的话就火冒三丈。会后总理对我说：“你太不懂了！”不懂什么？总理也不讲。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毛主席就看到了上报名单。主席对上报名单基本满意，只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个大叉，加上了叶群。在王效禹、叶剑英的名字下面画了个杠杠。后来主席说，我看王效禹就不考虑了。

林总看到名单后，在叶群的名字上面画了一个大叉，但林总没有加上江青，这真是神来之笔，可以摸摸主席对江青究竟是个什么态度。

在三人小组会上，周总理说：“我看到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单上删去的名字，但我们还是要考虑的。我们坚持把这两个人都列上，这也是从当前的大局来考虑。”总理指删去的名字是江青、叶群。这样又加上了江青、叶群的名字。

康生说：“总理的意见是对的，但困难比较大，我们硬着头皮留下来。”

黄永胜说：“我同意总理和康老的意见。”

在新的名单上，毛主席还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在名单的旁边写上李德生、纪登奎的名字。

林总同上次一样，收到名单即在叶群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

二十六日晚上三人小组继续在一起工作。主要是谈论江青、叶群两人的问题。

周总理说：“整个名单就是江、叶二人的问题。这问题解决了，整个名单就定下来了。从当前的情况出发，江青、叶群一定要入政治局。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诚恳表示我们的态度。我们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汇报，十二时后向林副主席汇报，争取在明天，把问题分别谈妥。”

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到毛主席住处。周恩来说：“我们诚恳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不列入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更大的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列入候选名单之内！”

毛主席：“你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就这样吧。”

周总理等三人接着就到林总家里去了。叶群接待了总理等三人之后，自动回避了。

周总理说：“关于叶群同志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的问题，从现实的政治情况考虑，我们三人认为一定要列入，否则会产生另外的政治影响，请林副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

黄永胜接着说：“我们刚才到主席那里去了，对江青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建议对叶群的问题，你也要同意我们的意见！”

康生说：“总理，黄总长把我们研究的意见都说了。请林总从政治上考虑，同意我们的意见。”

林总说：“无论同意或是不同意把叶群列入政治局候选人，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

最后，在毛主席住处开会。九届中央政治局候选人的名单定下来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李

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等二十五人。

主席说：“今天下午谈两个问题。一是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二是政治局常委名单。”主席接着说：“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只好就这个样了。有责任由我承担！”

接着，毛主席、林总、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等五人，在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上签了字。

毛主席又说：“中央的领导机构，力求简单权力集中的原则。政治局常委由五人组成，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请大家考虑是否合适？”林总、周总理带头，一致同意毛主席提出的原则。

大家都同意主席的安排，毛主席最后也说：“我也同意！”临走时，主席对黄永胜没头没脑说了一句：“你也能统管三军。”

主席在全会上的讲话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时半，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由京西宾馆一起出发去出席一中全会。临起身之前，黄永胜笑着说了两句话：“等一会就真相大白了，榜上有名的，可以自己选自己。”在选举之前，我同李作鹏也都没有想到自己也是政治局委员候选人。

九届一中全会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举行的，会议议程就是选举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开会时，坐在主席台上只有主席和林总二人，总理当时按照笔划排列坐在下面，这时主席叫总理上台时，大家才发现这个问题，大家对总理热烈鼓掌，肃然起敬，总理这才走上台去。主席说，九届一中全会就是选举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可以自己选自己。

不一会，就发选票了，我这时才看到自己名字在候选人之中。选举很快就结束了，总理宣布选举结果：我们主席，当党中央主席；林副主席当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是：主席、林总、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一共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员，四名候补委员。所有候选人全部当选。这次选举江青少好几票，张春桥、姚文元各少十多张票。由于自己可以选自己，得全票的不少。江青没有想到自己会少几张票，心里很不舒服，但没有发火也没有退席，只是坐在那里像一块木头那样连动也不动一下。

选举结束后，就在主席台前召开九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陈伯达、康生也坐到台上去了。新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坐台下前排。江青迈着慢悠悠的步子，是最后一个到达台前的。

主席说：“下面是什么议程呀？军委怎么组成？”

总理说：“下面是政治局第一次开会，我们对军委的组成有个建议名单，四十九人。军委主席还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是副主席，根据毛主席建议原来五位副主席（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还任新军委副主席，进行实际工作的，还是军委办事组。军委办事组由十人组成，办事组增加李天佑、李德生、刘贤权。”

总理刚说完，林总就说：“赞成。”

此时，黄永胜就抓紧时间发放军委办事组准备的关于中央军委委员名单，军委主席、副主席名单，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政治局会议以鼓掌形式通过了上述名单。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和人事任名单，固然在全党提高军委办事组的威信有重要作用，最主要的是向中央文革宣布：军委办事组，是在中央领导下，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指挥下的独立机构，根本不受中央文革的管辖。在九大之前，中央文革是否存在，没有正式议论过，江青一伙是力争中央文革继续存在。一中全会之后，中央虽未明文取消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则从未向他们作过任何请示报告，都在政治局日常办公会议上解决，军队本身的工作，按军委系统呈办。

议事日程完后，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又进来开会。主席说：“我没有话讲了，叫别人讲嘛。董老，你讲几句，老资格嘛。”

董老招招手表示不讲。

主席接着说：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呀这批“官僚”。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但他有个特点，他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恢复资产阶级专政。

主席说：

此外，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人家打来，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入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主席又说：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

主席最后说：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采取发公报的办法，现在外国人捞不到我们的新闻，说我们开秘密会议。我们是又公开又秘密。北京这些记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们把他们混到我们里头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登起来。自从王、关、戚、杨、余、傅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知道了。

一中全会散会的时候，会场上情绪总的来说，是相当热烈的！会场起立，经久不息地鼓掌，毛主席向左向右数次招手。

主席究竟对九大满意不满意？对林彪接班满意不满意？从九大当时的情况来看，主席好像是满意的，但从九大以后主席的一系列做法来看，主席是不满意的，他可能还是信了苏修“军事官僚专政”的说法，认为军队上了台，掌了权。主席通过文革打倒了刘少奇，搞掉了

刘邓的司令部“彭陆罗杨”，及在各地的“代理人”，刘少奇的权力夺回来了，怎么又送给了林彪？！其实权力还是百分之百地在主席手上，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的革委会第一把手，都由军队干部出任，这是毛主席自己的决定，这是“三支两军”的自然结果，这是主席打倒刘少奇在各地的“代理人”的必然结果。而且，虽然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的革委会第一把手都由军队干部出任，但他们并不听命于军队，从不向林彪和办事组请示工作，而听毛主席、总理、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的。但九大以后江青并没有得到多大实际权力也是事实，这和毛主席的初衷相不相符也难说。现在看来，九大以后，对主席是一个机会，“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立即“克己复礼”，落实党的政策，认真甄别干部，大搞经济建设。但是主席并没有这样做，不知是主席没闹够，还是江青没闹够，他们又开始闹林彪，闹军队了。

九大以后，碰头会没有了，中央文革没有了，政治局在总理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张春桥一个时期回上海工作了，江青没有具体分配重要工作，中央的日常工作是顺利的。但好景不长，张春桥回来了，又成立了中央宣传小组，对政治局的通盘工作影响很大。这时主席开始挖苦林彪（四个伟大讨嫌啦，缔造不能指挥啦，三个副词啦，等等）——然后是国家主席问题——然后是九届二中全会问题——然后是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然后是华北会议——然后是中央工作会议（批陈整风汇报会）给黄、吴、李、邱下结论，戴上紧箍咒——然后是南巡，点了林的名，准备在九届三中全会拿下林彪——然后是“九一三”。